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定铎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八)

编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常熟第七印刷厂

(上海绍兴路5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89年12月

ISSN 1000-6109

国内统一刊号 CN81-1229

定价 3.05 元



谢希德曹天钦夫妇从国外回到祖国时合影



1988年4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部分领导同志为老教育家吴若安祝贺百岁华诞。居中者为吴若安，自左至右在座为葛志成、吴邦国、杨士法、胡立教、谈家桢、张承宗、唐君远、汪道涵、谢丽娟、左英、毛经权、陈国栋、杨堤



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黎照寰于1958年七十岁时拍摄的照片

上海市副市长(现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中)1985年1月27日在上海宾馆接见中国天主教上海教区张家树主教(前排左一),右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任宗怀德



三十年代女工到中华基督教上海
女青年会沪西女工夜校上学时的情
景



中国天主教上海教区
张家树主教于1985年5月
24日进教之佑瞻礼在佘山
大堂讲道

目 录

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	谢希德(1)
回国前后和感受·····	高怡生(7)
从海外争取回国的经过·····	刘铸晋(12)
国共第一次合作在上海的活动·····	任武雄(16)
杨杏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叶 累(33)
抗战前期上海职业界的统战工作·····	许德良(43)
回顾中国技术协会的统战工作·····	闵淑芬(50)
记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国际联谊会·····	邢 泽(67)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	(75)
回忆黎照寰先生·····	赵祖康(92)
为交通大学作出重大贡献的黎照寰校长·····	童大坝(95)
我所认识的黎照寰先生·····	陆 诒(98)
记爱国人士黎照寰·····	黄松岗(101)
我的道路·····	吴若安(107)
忆卢于道同志·····	徐常太(127)
怀念潘念之同志·····	陈修良(137)

书法家沙孟海的一些往事	陈修良(146)
刘湛恩先生生平事迹	屠良章(160)
我所知道的刘鸿生先生	胡世奎(167)
抗战初期先父刘鸿生对中共的态度	刘公诚(182)
怀念张家树老主教	李思德(188)
张家树主教的嘉言懿行	余 青(194)

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

谢 希 德

1952年8月，我和爱人曹天钦一起，乘坐英商蓝烟囱公司的万吨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启程回国，至今已36年了。36年来，我心情舒畅地为祖国贡献力量，感受到欣慰与欢乐，也在“文革”中有过痛苦和悲伤。粉碎“四人帮”之后，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不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早有考虑的，因此回答得很坦然：“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今天，每当我回顾自己从海外归来这段历程时，心情还是异常兴奋和激动。

1921年3月，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我4岁时，生母因患伤寒病过早地离开人世，此后，父亲、祖母和我一家3口迁居北京，住进了燕园。我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后归国应聘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继母很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健康。1932年，我在念初中时，天钦恰好与我同班，彼此相互了解，再加上我们的父亲在燕京大学是同事，因此我俩有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了1946年春，我正好25岁，便与天钦订婚。当时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正准备到英国深造，而我却在福建长汀县的厦门大学即将毕业。虽然我们都有为祖国科学事业作贡献的强烈愿望，但国内的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忧虑。抗战胜利的喜悦已为内战的愁云所代替，物价飞涨，生活颠沛，我们认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能暂时出国学习。临别时，我俩约定，我随即争取赴美深造，两人结束学业时在美国聚合，一同回国。

1946年夏，我告别母校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秋天开始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不久，我考取赴美自费留学，即通过在美友人联系就读的学校，1947年进入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学院在麻省的一座小城市，当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美国7所著名女子学院之一，以培养本科生为主，部分系科兼收少量研究生。我在该校物理系任助教，并攻读硕士学位。在顺利完成两年学业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堪称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藏书丰富，设备齐全。我更幸运的是能在W. P. Allis和P. M. 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特别是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在运筹学领域是开拓者，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和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并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1949年10月后，母亲和弟弟们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中华

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解放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学者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希望我和天钦早日归国。在校的中国同学大都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但是，后来我也从别的地方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说：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楼自杀。这时，我在思想上也有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我心想，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却留在国外，实在说不过去，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责无旁贷，不能再等了。

时间很快推移到1951年春天，天钦获得博士学位，这年秋天，我也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准备按原先的约定，让天钦到美国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可是意外的事件发生，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我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声势越来越大。美国移民局在1951年下半年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大陆。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不过，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回国的办法。

我俩经过一番商讨，决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我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天钦即向英国有关部门提出为我签证的要求，不料英国方面鉴于当时国内情况，表示除非我提出保证，在3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我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

但是，3个月离开英国回国的保证，又会给我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李先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亲自到英国有关部门，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很快为我签署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凭此我可以进入英国。

但是，有了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发给出境证明，我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我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由我以赴英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并向移民局出示英国有关部门签署的“旅行通行证”。结果移民局为我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我出主意，结了婚赶快回来。我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一看，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因此，天钦关照我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哈德孙港后，再给他发电报，只有到那时，我的出走才算成功。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象到了英国国土。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即有人来到船上，问我为什么去英国，我镇定地一一作了回答。他看了看我的行李，再也没有继续盘问下去，递给我正式的出境签证。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礼和联系回国的事。天钦早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先生有书信往来，并决定到他那里工作。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他们为我联系到交通大学任教。结婚仪式很简单，请了天钦的几位朋友光临，随后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父亲不支持我们的这一举动，他希望我留在美国或英国工作，但我们早已决定，父亲再也不理我们了。

1952年8月底，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香港到达深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我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列车在上海火车站一停下，我们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便又风尘仆仆踏上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天钦的父母。从北京返沪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交通大学物理系大部分并到复旦，11月中旬，我便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开始紧张的工作。1956年5月，曹天钦和我在同一天分别由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在“文革”中竟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我是“特务”，理由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同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我说，平时你讲课时逻辑性很强，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却讲不清楚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我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难以讲清。因此我和天钦都遭到批判、斗争，我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达9个月之久。低温实验室是我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却成了禁闭我的隔离室。我的10岁儿子在家里

独自生活，天天盼望母亲归来，我家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威吓而自杀身亡。在残酷斗争中，我身心受到摧残，乳腺癌病情加重，只得请求到医院进行放射治疗。我心里明白，“文革”中出现的这些反常现象决不是党和人民所能允许的，只不过是少数人暂时的倒行逆施。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我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1983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同时挤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近年来，又参加了党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36年前，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不远万里几经周折回到祖国怀抱，做了一点工作，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母校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等7所大学也授予我科学博士的荣誉称号，这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再立新功。

回国前后和感受

高 怡 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是在国外知道的。从1948年下半年起，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中国，我们每天都可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些比较确凿的消息，而这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是看不到的。我们这辈人已久经战乱，对战事胜败消息司空见惯。但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最终败绩是心中有数，只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之快而已。对共产党，当时一般知识界并不惧怕，他们对抗战期间解放区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也不相信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记得那时一本介绍解放区情况的《西行漫记》，流传颇广。人们总的印象是：解放区人民生活艰苦，但抗日思想坚定，人格高尚，是奋发有为的青年所向往的地方。在抗战胜利之前，我的挚友邢其毅先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携眷从上海去新四军解放区，行前曾来我家话别，说起一些他所知道的解放区情况，共产党非常希望科学工作者前去工作。高级知识分子多半知道共产党是不会被消灭的，解放区比国民党统治区来得安全。南京解放前，我胞弟来信说要离家出走，我即复信叫他向北方去而莫向南去，也说明了我的心情。当然，那时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全都希望共产党立刻统一全中国，而是希望国共合作，和谈成功，以共同振兴中华。另一方面，共产党统一全中国了，我们这些人也不

会恐慌。那时，不少科学工作者参与政治的兴趣是不浓的，认为国民党工作是振兴中华，为共产党工作也是振兴中华，现在看来，前一种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当时某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共产党统一中国是不太高兴的，在经济方面不愿有所帮助。同时也不希望在他们国家留学的人回新中国服务。美国政府硬性阻拦中国留学生回大陆，英国则比较实际，因为她较早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阻拦中国留学生回大陆的并不多见，但他们曲解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有些获得学位后、特别是工作能力较强的中国留学生，常建议他们留下就业，这就是不少人羁留国外的原因。我也是经历这一过程者之一。当时与我同在牛津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10人左右，牛津小城，同学相会之机甚多，假日常相聚闲谈娱乐。同学中由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派去的人不少，如张素诚（现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朱岗崑（现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崇武（历史研究所，已去世）、戴自英（上海医大华山医院）、阳含熙（北京林学院）等人，均常在一起。祖国解放后，我订了一份香港《大公报》，大家都来阅看，以了解国内情况。大家谈的都是祖国将来建设的前景，对共产党没有恶感，也没有一人想留在国外。后来，大家确都相继回国。这说明爱祖国，爱家乡，是中国留学生的特点。

1950年，我们与国内通讯频繁了，祖国传来的消息比我原来所估计的要好得多。我以前的导师庄长恭先生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他是在上海解放前几个月，坚决辞去台湾大学校长回到上海迎接解放的。我出国前是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出国后一度停薪，但北平研究院迁至台湾后仍将我薪水寄到英国，台湾方面也希望国外学子能去台。上海解

、放后，中国科学院接管了药物所，台北方面就停发了我的薪水。当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是庄长恭先生，药物所由于人员稀少，暂时归入有机所，成立一个药物化学研究室（直至1952年才又独立成为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由原所长赵承嘏先生担任室主任。解放前的研究所，到此时已境况凄凉，人员寥落，原药物所在解放时就只剩下3个人在维持招牌。所以一解放第一件大事就是搜罗人材，两位前领导均有信给我，盼我及早回来。我的愿望也是如此，遂婉言谢绝了国外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推荐我留在国外的好意，于1950年10月回到了新中国。事实上，中国科学院从4月份成立之始即恢复了我的薪水，以照顾我家属的生活。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重视和关心可见一斑。

一踏进新中国，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国民党时期社会一片混乱的情景不见了，而是物价稳定，秩序井然，虽待遇不高，但人心安定。1950年10月，我回到久别的药物所，虽然面貌依旧，但能开展正常工作了。最使我宽心之事，是所方为我安排了我和家属的住房，这是我解放前在上海多年无力解决的问题。以前我独身在沪工作，住在实验室旁的一间阳台边的小房间里，连电灯也没有，每天要自己买菜烧饭，以充三餐。这苦日子现在一去不复返了，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既无后顾之忧，乃全力想把工作搞好。首先是扩大所的人力，特别是学术领导人选，争取国外学人多些回来，我实事求是地写信告诉他们我自己的经历。结果有些人回来了。药物所就是在这批首先回国的学者的工作下得到了发展，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发展到今天已是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单位。1953年，我担任这个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